

《水浒传》英译研究:成绩、问题与对策

汤金霞 梅阳春 黄文*

〔摘要〕 文学典籍《水浒传》的英译研究经过 80 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丰厚的成绩,研究语料由单一到多样,研究模式由单纯的译本文本分析到相关译本文本分析与其翻译环境研究有机结合,研究基调由极端转向客观、辩证;但同时也存在杰译本、登译本研究不足,多译本对比研究不足,史学研究发展迟缓,原著文体模块翻译系统研究亟需等问题。学者们需树立严谨的学风,加强考据研究方法,系统开展杰译本、登译本研究、国外读者译本评价研究、《水浒传》文体模块翻译研究以及新语境下《水浒传》的复译研究。

〔关键词〕 《水浒传》英译研究;成绩;问题;对策

如果将 1933 年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对赛译《水浒传》所作的评论视为源起,国内《水浒传》英译研究至今已走过 80 余载历程,产生了数百篇论文。中国知网的统计数据显示,仅 1979—2014 年间就产生了 240 余篇论文,有单译本研究,有译本对比研究,还有史学研究。该研究领域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拟对国内《水浒传》英译研究进行梳理,总结成绩,指出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可资借鉴的对策。

一、《水浒传》英译研究的成績

1. 研究语料不断丰富

如果将 70 回本以上版本视为全本,《水浒传》到目前为止共产生了四个英译全本,分别是赛珍珠(Pearl S. Buck)的 All Men Are Brothers,杰克逊(J. H. Jackson)的 Water Margin,沙博理(Sidney Shapiro)的 Outlaws of the Marsh 和登特·杨父子(John and Alex Dent-Young)合译的 The Marshes of Mount Liang(即赛译本、杰译本、沙译本和登译本),四译本初版时间分别为 1933 年,1967 年,1980 年和 1994—2002 年。然而 1933—2000 年间,国内《水浒传》英译研究几乎都以赛译本为语料,对于这段时间内出现的杰译本和沙译本,研究界少有人问津。进入 21 世纪后,《水浒传》英译研究语料逐渐丰

* 汤金霞、梅阳春,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黄文,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210097。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大中华文库》的中国典籍英译翻译策略研究”(13BYY034)阶段性研究成果。

富,不仅其他三个译本的研究陆续开展,译本对比研究、《水浒传》英译史学类研究也逐渐展开。

2. 由单纯的内部研究升至内外研究有机结合

国内《水浒传》英译研究刚开始以译本对原著中的四字结构、习语、称谓语、粗俗语、方言词、人物绰号、地名、谚语、社交指示语等具体语言文化现象的翻译策略为研究客体,研究模式基本为相关语言文化现象的原文和译文的语言学比读,基于比读结果推衍译者的翻译策略,属单纯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该范式置翻译研究于一种天真的假设前提之下,即“翻译是在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与影响的真空条件下进行的”^①,而《水浒传》的翻译实践证明“翻译从来就不是可以任意而为的私人事务……它至始至终都是受着各种权力话语左右和操控下的行为”^②。如沙博理在翻译百回本《水浒传》时,前七十回一开始采用的是金圣叹本,后来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被迫改为容与堂本。由此可见,《水浒传》英译研究应该是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方能科学合理地解读译者的翻译策略,为类似文本的翻译实践提供有效指导。

2004年,《水浒传》英译研究由单纯的内部语言学层面研究转变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李林波以赛译本文本分析为基础解析译者的异化翻译策略,但跳出了以往研究拘囿于简单文字层面考证的俗套,着力分析译者“选择异化翻译策略的文化原因和译本的文化价值”^③,开启了从文化学、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水浒传》英译的新模式。唐艳芳基于文本分析,“从译者主体地位的历史演变和《水浒传》英译的时代背景出发”^④,阐释赛珍珠在翻译题材选择、内容取舍以及书名翻译等方面展现的译者主体性。她认为这种主体性在后殖民语境下对处于弱势话语地位的“边缘文化”挑战占据中心话语权的强势文化意义重大。董琬基于“译者思维模式探究赛珍珠《水浒传》的翻译”^⑤,通过比读《大地》和《水浒传》赛译本后发现赛氏翻译与其创作一样都由其以汉语为基础的思维模式主导,这种独特的翻译思维模式使得赛译《水浒传》折射出了汉语特有的表达方式,而造成这种思维模式的原因正是中国传统哲学对赛珍珠潜移默化的影响。

除了以上几种研究模式外,尚有学者基于译本文本分析,借鉴翻译伦理、翻译目的论、多元系统论、关联论、顺应论、权力话语、生态学、社会符号学、接受美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开展《水浒传》英译研究,使得国内《水浒传》英译研究不断创新。

3. 研究基调由极端转向辩证

由于长期受传统文论模式的影响,中国的翻译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忙着对别人的翻译作品或翻译标准作价值判断甚至道德审判……而纯翻译学家的工作则很少人做”^⑥这种评判译者译品优劣的研究模式数十年内一直主宰国内《水浒传》英译研究。我们不是说不可评判译者译品的优劣,毕竟这种研究模式在中外翻译研究领域都存在,且在一定程度上亦能凸显译者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引以为鉴的教训。只是翻译研究应当使一切与翻译相关的现象都成为研究对象,以便通过“对翻译问题进行可证实的理论概括”^⑦为相关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指引。可见,评论《水浒传》译者的译品优劣本身并无不是,但基调应客观、辩证,既要指出其成功的经验,也要道明其翻译缺陷,因为没有哪位译者的翻译完美无缺。

2000年之前,以赛译本为主要研究语料的国内《水浒传》英译研究基调甚为极端,几乎为清一色

①吕俊:《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3页。

②吕俊:《英汉翻译教程》,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7页。

③李林波:《对赛珍珠〈水浒传〉译本文化意义的再思》,《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④唐艳芳:《时代背景与译者主体性的互动——论赛珍珠〈水浒传〉英译选材的主体性》,《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⑤董琬:《赛珍珠以汉语为基础的思维模式——谈赛译〈水浒传〉》,《中国翻译》2010年第2期。

⑥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⑦G.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 11.

的否定。例如,“放屁”一词在《水浒传》中共有 14 处,著名学者钱歌川仅凭“武行者心中要吃,那里听他分说,一片声喝道:‘放屁!放屁!’”中的“放屁”被赛珍珠译为“Pass your wind”一处例证就将赛译定性为“误译”^①,而其他研究者亦纷纷效仿,据马红军统计,“仅 1995 至 2002 年期间,论及赛珍珠‘放屁’译文的文章高达 21 篇”^②,而事实上原著中除了上句和“你在家时,谁敢来放个屁?”两句中的“放屁”由于所处的上下文过于短小,句内内涵支持略显不足使得将其翻译为“pass……wind”容易产生歧义或误解外,其余 12 处的译文还是可取的,但 2000 年之前,这一点却无人撰文明示。不仅如此,赛译本的成功之处在这段时间内也很少有人阐明,这不能不说国内《水浒传》英译研究的基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过于极端。

2001 年,《水浒传》英译研究基调开始转变,徐学平在《试谈沙译〈水浒传〉中英雄绰号的英译》中指出沙译大多数能够表达出原文绰号的字面意思、内涵意义和言外之意,基本上传递出了绰号的民族文化特征。徐同时通过可信的例证指出,译者对某些绰号的原文意思考证不够准确,以至于产生了误译,或者译文与原文有较大差距;有时候为了求得易解,对一些绰号进行了不恰当的转换,或者直接隐去绰号蕴含的汉语文化信息,这一切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颇为不利。路东平在论文《试谈〈水浒传〉中称谓的使用及其翻译》中称谓的使用及其翻译》基于文本分析论证沙译本对原著亲属称谓、尊称和谦称的翻译策略时指出,译者的大部分称谓译文能够在目的语中实现交际目的,但译者将原著中许多带有不同意味的称谓简化为一种表达法(如“相公、丈夫、官人”都被译成了 husband)的做法则未能把相关原语称谓的文化语用含义全面准确地体现出来。李林波亦辩证地探讨赛译本的异化翻译策略,她指出赛珍珠为了向西方读者呈现一个原汁原味的水浒故事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对《水浒传》“异质”特征的保留胜过沙译本和杰译本,但其在原著题目翻译上对译语文学规范的顺从,其采用的接近于《圣经》语体的译文语体以及其对原著一些信息的遗失和歪曲使得经过越洋跋涉之后的“《水浒传》已非彼《水浒传》”^③。

笔者认为,眼下最能体现国内《水浒传》英译研究成绩的当属唐艳芳的博士论文《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研究》。这篇论文语料丰富,虽然探讨重心为赛译本,但亦有相当的篇幅比读赛译本和《水浒传》的其他英译本,既有词汇、姓名、称谓、冒辞等细小语言文化单位的研究,也有句法和篇章等较为复杂的语言文化单位研究。不仅如此,该论文集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为一体,以文本分析为基础,以后殖民理论为主线,通过将后殖民理论中的权力和差异诉求和译者主体性联系起来,引入主体间性概念,从词语、句法和篇章话语三个维度论述赛珍珠的“陌生化”翻译策略。此外,这篇论文研究基调客观、辩证,既肯定译者“陌生化”翻译策略对《水浒传》外宣事业的促进作用,也批评译者对原著典故、习语等模块的某些处理方法。

二、《水浒传》英译研究存在的问题

国内《水浒传》英译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赛译、沙译研究为主,杰译、登译研究不足

现有的约 160 篇探讨《水浒传》单译本的论文中约有 150 篇探讨赛、沙译本,专论登译本的只有 7 篇,专论杰译本的更是少得只有 3 篇。

①钱歌川:《翻译的基本知识》,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年,第 10 页。

②马红军:《为赛珍珠的“误译”正名》,《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 年第 3 期。

③李林波:《差异,对翻译意味着什么》,《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 年第 6 期。

三篇专论杰译本的论文中,王畅的《〈水浒传〉杰克逊译本中习语翻译的补偿研究》和陈丽丽的《〈水浒传〉中带标记的被动句式英译研究》分别探讨杰译本对原著中的习语和被动句式采取的翻译策略以及相关策略的效果,黄昭奎研究的是杰译本对原著中的典故词、宗教术语、民俗词汇等文化词的翻译策略。不难看出杰译本研究目前仍处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翻译研究的字词、句式层面,远未形成系统研究。登译本的研究状况稍微好些,研究者或从功能对等角度探究登译本对原著中常见修辞手法的应对策略,或从翻译目的论的角度论述登译本对原著中某些语言文化信息的误译,或以后殖民主义理论为视角分析登译本对原著文化习语的传递效值以及对中国古代风俗的转换方式和翻译策略。但登译的研究者们往往将研究重心放在登译《水浒传》的外部层面,译文文本分析不够深入。如论文《后殖民语境下〈水浒传〉英译本的文化特征——登特·杨新译本批评》从历史文化语境、翻译体制、翻译价值取向、翻译策略与方法四维度审视登译本,得出的结论是译本采取了典型的改写和透明翻译策略,该策略折射了译者对目标读者翻译期待的主动迎合,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①然而支撑这些结论的例证仅为对“南柯一梦”、“有眼不识泰山”、“唾手而取”三句俗语以及原著收尾诗歌在登译本中的译文的文本分析,恐难让人信服。

2. 双译本对比研究为主,多译本对比研究不足

译本对比研究一共有 77 篇论文,其中有 62 篇对赛译和沙译进行比读,三译本对比研究为 8 篇,四译本对比研究只有 7 篇,对比客体多为诸译本对原著书名、绰号、称谓语等采取的翻译策略以及翻译效果。虽然这些论文大多借鉴文学或翻译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但其中诸如《试析〈水浒传〉部分专名的英译》、《〈水浒传〉两译本的粗俗语英译评析——以“屁”的翻译为例》、《意识形态对英译〈水浒传〉的操纵》、《山峙而双峰,禽飞而并翼——赛珍珠翻译的平衡和谐风格剖析》、《〈水浒传〉人物绰号英译之对比赏析》等论文只是照搬某些单译本研究的研究框架,从多个译本中罗列译例分析而已,研究方法有待革新。

孙建成的《〈水浒传〉英译的语言和文化》和刘克强的《〈水浒传〉四英译本翻译特征多维度对比研究》是多译本对比研究中较有新意的论文。孙从语言、文化和语境三个维度探究《水浒传》四个英译本的翻译策略以及隐藏在相关翻译策略背后的原因。他指出《水浒传》的英译过程是两种语言形式、经验价值、内容审美与两种文化政治、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对话过程,也是译入语通过词语选择、句式调整、结构变通、修辞以及增删等手段对原语语篇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改编的文化暴力过程。如同其在论文《后殖民语境下〈水浒传〉英译本的文化特征——登特·杨新译本批评》所做的那样,这篇文章也将研究重心放在翻译的外部环境,文本分析不足,结论是否合理有待商榷。刘从宏观层面(包括词频、词汇、词块、句对、语篇以及主题词、主题语义域的特征和四译文的相似度)和微观层面(包括高频动词 take 的类联接及搭配词的特征、四译本回目翻译、话语标记翻译、典型动词翻译以及詈词翻译)对《水浒传》四个英译本的翻译特征进行多维度对比。虽然刘宣称该文综合利用语料库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及文体学、信息论等理论,但其研究主体仍是四译本的内部微观层面,未能很好地实现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有机结合。

3. 史学研究进展迟缓

史学研究除了论文《关于近年赛译〈水浒传〉研究的反思》和《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研究——后殖民理论视角》用一定篇幅探讨过赛译《水浒传》的研究模式和存在的问题,《〈水浒传〉英译的语言与文化》简要回顾《水浒传》四个英译本的研究概况之外,全面梳理《水浒传》多个译本研究状况的论文只有 3 篇。王丽娜的《〈水浒传〉在国外》为《水浒传》在多个语种的传播概况,英译研究只占其中

^①孙建成,温秀颖:《后殖民语境下〈水浒传〉英译本的文化特征——登特·杨新译本批评》,《外语研究》2008 年第 2 期。

很小的篇幅。许燕的《二十年来〈水浒传〉英译研究》时间检索为1979—2007年,文军,罗张(2011)的《国内〈水浒传〉英译研究三十年》,时间检索为1979—2010年,两篇论文都没有涵盖2011年以后该领域内的研究成果。文军,罗张宣称以“1979年为起点,以2010年为终点,共搜索到68篇有关《水浒传》英译研究的论文”,^①而据笔者检索,同时间内国内出版的相关论文至少在百篇以上。许燕宣称以《水浒》、翻译为题名、关键词、篇名等检索1979—2007年期间中国大陆发表的有关《水浒传》英译的学术论文,但仅以经过筛选整理的18篇论文作为其探讨国内《水浒传》英译研究的发展概况与模式的语料,得出的结论是否准确还有待商榷。遗憾的是,更能说明《水浒传》某个译本英译策略是否成功的国外学者发表的《水浒传》英译研究的论文,国内至今尚无有学者梳理归纳。

4. 原著文体模块系统翻译研究匮乏

《水浒传》是中国文学史上继《三国演义》之后第二部白话章回体小说,它与前者一道发展了宋元话本所开创的以白话长篇为小说文体形式的文学趋向,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扩大了读者面,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功能。《水浒传》折射的北宋时期文化固然是构建其不朽艺术价值的重要模块,其白话章回体小说的文体形式也是其不朽艺术价值的构建模块之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若只关注原著的文化模块,忽略原著的文体模块就很难使译文呈现原著的全部艺术价值。所以,对《水浒传》英译事业有重要影响的《水浒传》英译研究既应该研究这部小说文化模块的英译策略,也应该探讨其文体模块的英译策略。现有研究中,只有白鹤、赵澍在论文《浅析中外名著文体的不可译性》中简要提及沙译本对原著章回标题和韵文的翻译效果,王丽虹在论文《中国章回体小说的艺术特色及沙博理对〈水浒传〉的英译》中探讨沙译本对原著回目标题、韵文、插说、回目收尾诗句的翻译对策,张彩凤在论文《从沙博理〈水浒传〉英译本看文学风格的可译性》简要提及了沙译本对原著分回设目的特征移植效方式,张晓华等在论文《谈由文化差异导致文学风格的不可译性——莎皮罗〈水浒传〉英译分析》中简要评论了原著韵文在沙译本中的再现策略,除此之外再无其它研究。可见,译文文体模块系统研究应该是今后《水浒传》英译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区域。

三、破解《水浒传》英译研究存在问题的对策

上述问题若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会对《水浒传》英译研究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下文将尝试为破解以上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具体对策。

1. 树立严谨的学风,加强考据的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需要树立严谨科学的学风,避免以讹传讹及重复研究以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研究人员首先应当具有拓荒精神,敢于投身于《水浒传》英译研究的薄弱环节以及新领域的研究,如杰译本、登译本研究,译本对比研究,译本评价研究等等。研究人员还需要加强考据的研究方法,并与国内《水浒传》实证研究的新成果相结合^②,即使是《水浒传》相关插图研究也对海外翻译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对理解《水浒传》这部巨著有着一定的作用。史学类研究人员应当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国内外,尤其是国外《水浒传》英译研究的历史,数据应力求准确,材料应力求齐全,不能管中窥豹,以偏概全。多译本对比研究人员应敢于突破陈套,不要简单套用单译本研究模式,以免造成换汤不换药的

^①文军、罗张:《国内〈水浒传〉英译研究三十年》,《民族翻译》2011年第1期。

^②近年来,国内学者相继发表了一些关于《水浒》的考证文章,如张锦池《〈水浒传〉原本无征辽故事考——兼说〈水浒传〉原本的回数》,《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1期;许勇强、李蕊芹《元代水浒杂剧与〈宣和遗事〉关系新论》,《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3期,等等。

重复研究。译本比读材料必须全面,应当涵盖《水浒传》现有的所有英译本。此外,学术主管部门应当起到良好的规范作用,严格审查学术材料,坚决杜绝抄袭剽窃以及重复研究现象的发生。

2. 杰译本、登译本的系统研究

登译本研究少可能是因其诞生时间较晚,尚未引起多数研究者的注意,但杰译本的全译本出版于1963年,应该不存在接受时间不足的问题,该译本的被忽视恐怕是受杰克逊1933年出版的《水浒传》节译本的负面影响。由于杰克逊的节译本对原著删减、改写幅度很大,以致于《水浒传》的另一位译者沙博理在论文《〈水浒传〉的英译》中认为该译本“译文相当不准确”^①,但沙先生并没有在文中就此提供实例支撑,翻译界迄今除了王克友、任东升在《叙事方式的转换与小说翻译效果叙述方式的转换与小说翻译效果——以〈水浒传〉第47回三个译文为例》中通过实例论证该译本“用译入语的文本叙事模式传达或取代原文的效果”^②外,再无其他人员提供相关例证。但仅凭数项研究就将杰译本彻底打入死牢对其也太不公平,翻译界应当对杰译本进行更进一步研究,系统论证该译本在哪些方面背离了原著,什么原因导致了译者对原著的背离,译者的背离对汉英跨文化交际有什么负面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杰克逊汲取了评论界对其《水浒传》节译本的反馈于1963年出版了《水浒传》的全译本,并于1979年再版。杰克逊的全译本采取了什么样的翻译策略?与其节译本有什么不同?促使杰克逊全译《水浒传》的历史文化语境是什么?等等,这些都值得研究人员去考证。

如前文所述,国内登译本研究的缺陷在于过于强调翻译活动的外部层面,对译本的文本分析不够。有鉴于此,研究者们需要对登译本进行系统的内部研究,从词汇等微观语言单位直至篇章等宏观单位对登译本进行全方位透视。毕竟外部研究的合理与否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内部研究支撑,否则极有可能使研究流于主观臆断。

3. 国外读者译本评价研究

“评价译文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达到了译者的翻译目的”^③,赛译《水浒传》旨在让“目标语中不懂汉语的读者感觉他们在读原著”^④该译本在英美世界多次出版的事实说明它实现了译者的翻译目的。沙译《水浒传》的翻译目的与赛译本一样,但其在英美世界的传播效果远不如前者理想。当然我们并不能据此断言沙译本没有实现其翻译目的,但是国内学界对沙译的评价高于赛译,而赛译本在国外的传播效果比沙译理想的事实应当令《水浒传》英译的研究者们探寻个中原因。系统分析国外读者对《水浒传》不同译本的评价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经之路。在此过程中,尤其需要对比分析国外读者对某个译本的肯定评价以及国外读者对相同译本的否定评价。只有这样我们方能得知目标读者对《水浒传》英译的“期待规范(expectancy norms)”^⑤,并通过相关译本的文本分析进一步得出国外读者对《水浒传》英译本的“母体规范和文本语言规范”^⑥。

4. 《水浒传》文体模块翻译研究

《水浒传》的文化模块和文体模块共同构建了其不朽的艺术价值,现今国内《水浒传》英译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文化模块的英译上,对其文体模块的英译研究尚不够。在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汉语文化话语权不断增强,汉语典籍的文体价值越来越被英美世界认可的新语境下,《水浒传》的英译应该是文化模

①沙博理:《〈水浒传〉的英译》,《中国翻译》1984年第2期。

②王克友等:《叙述方式的转换与小说翻译效果——以〈水浒传〉第47回三个译文为例》,《外语教学》2005年第4期。

③B. Hatim & I. Mason,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London: Longman, 1990, p.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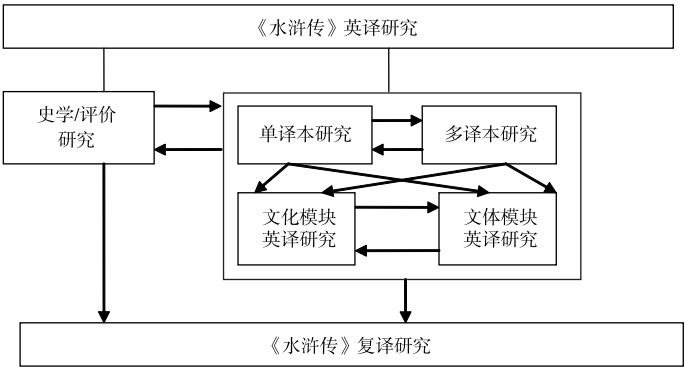
④P. S. Buck, *Translator's Preface to All Men Are Brothers*, trans. by P. S. Buck, New York: Mayor Bell Company, 2010, p. xvii.

⑤A. Chesterman,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p. 65.

⑥J. Munda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114.

块与文体模块并重。《水浒传》英译研究应当顺应新语境,在《水浒传》文化模块英译研究和文体模块英译研究并重的同时,针对当前文体英译研究滞后的现状适当突出这方面的研究。首先是《水浒传》文体系统的构建模式研究。目前,《水浒传》文体英译研究主要谈论该部小说的回目标题和文内诗歌的翻译策略及翻译效果,对于原著文白相间、并列句式、话语风格等模块的关注得不够,而《水浒传》线状的情节结构与流线性的动态施事句存在着焦点散落、线性发展的同构性,人物形象塑造重平行、比较,耦合类的关系句重对偶、并举,针对此类的翻译还有待加强,全面系统地阐释《水浒传》文体系统构建模块的研究亟待开展。除了构建《水浒传》的文体系统,《水浒传》英译研究还应探究四个英译本对原著文体的翻译策略、翻译效果以及相关翻译策略背后的原因。此外,《水浒传》的英译是一项与时俱进的事业,不同时代呼唤不同的译本,因此翻译界还需尝试新语境下《水浒传》的复译研究。

综上所述,今后国内《水浒传》英译研究应当包括史学/评价研究、单译本研究、多译本研究以及复译研究四部分,其中单译本和多译本研究都应涵盖文化模块英译研究和文体模块英译研究两个层面,两个层面交流互动,共同发展;单译本研究和多译本研究之间亦存在互动,两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史学/评价研究提供语料,后者的研究成果反过来又可促进前者的发展;单译本研究、多译本研究和史学/评价研究的成果为《水浒传》复译研究提供坚固基石,相关部分的关系图示如下:



(责任编辑:陆 林)

**A Study on C-E Translation of *Shui Hu Zhuan*:
Achievement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TANG Jin-xia, MEI Yang-chun, HUANG Wen

Abstract: Over the past 80 plus years, studies on Chinese to English (C-E) translation of *Shui Hu Zhuan*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With the help of much more diversified research corpora, research methods have been shifted from textual analysis of English versions to its integration with different translation environments. Also, the tone of studies, rid of extremity, tends to be more objective and dialectical.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deserving our attention. Without sufficient studies on the versions of J. H. Jackson and of John and Alex Dent-Young, as well as comparative studies on other versions, relevant historical studies have developed slowly, and studies on the translation system of *Shui Hu Zhuan*'s stylistic features are in urgent need. Hence, scholars should take a serious attitude and improve their research methods, so as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versions of J. H. Jackson and of John and Alex Dent-Young; the evaluations of readers abroad on different versions; the translation system of *Shui Hu Zhuan*'s stylistic features; and the re-translations of *Shui Hu Zhuan* against new contexts.

Key words: studies on C-E translation of *Shui Hu Zhuan*; achievements; problems; solutions